

# 苏联经验重探

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

[美] 斯蒂芬·F·科恩著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L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 苏联经验重探

——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

〔美〕斯蒂芬·F·科恩著

陈 玮 译

东方出版社

Stephen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5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5 年英文版译出

**苏联经验重探**

——1917 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

SULIAN JINGYAN CHONGTAN

——1917NIAN YILAI DE ZHENGZHI HE LISHI

作者/[美] 斯蒂芬·F·科恩

译者/陈 玮

封面设计/王师颀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12,000

版次/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650

---

 东方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011-3/D·31

(书号 3453·33) 定价 0.95 元 (内部发行)

社会主义作为思想、运动和制度，在当代世界上正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中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冲破了过时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思想观念。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同时推动着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

本丛书选译国外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向读者介绍世界上出现的这一新的情况和有关的成果，以便了解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新思潮，供读者研究并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

DG 86/01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斯蒂芬·F·科恩，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1973年曾撰写一部研究苏联问题的专著：《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1888—1938）》，1982年出版了中译本。

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苏联问题的一部新著，198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丰富的史料，通过对传统的西方“苏联学”的各种观点的分析，从理论上重新探讨和评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并从改革的角度论述了苏联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作者所持的观点，当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的，为了供研究者参考，我们都一仍其旧，未加删节。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学术传教：作为一门专业的苏联学 .....	5
第二章 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	43
第三章 布哈林、新经济政策及关于对斯大林 主义的选择的思想 .....	78
第四章 斯大林以后的斯大林问题 .....	102
第五章 改革的友与敌：苏联的改革主义与保 守主义 .....	141

## 前 言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小册子，而论述的却是个大题目——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迄今的苏联历史和政治，显然很不相称，对此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本书有两个目的，但都不是要对苏联的历史作详尽的叙述。第一个目的，借用眼下时兴的名词，是修正，即对于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早就进行研究并作出定论的苏联历史上形成历史分期的重大事件及其后果作出修正，重新考虑对重大问题的解释。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苏联学研究专业经常提出苛刻的挑剔。因为在学术界，苏联学研究的流行观点总是离不开陈旧的老框框，总是以一成不变的苏联制度、共识的政治答案、简单化的历史解释为出发点，对此，我将在本书的第一章详加说明。但是，我的论题是丰富多采的苏联现实、变革、需要以分析的眼光提出问题并作出复杂的综合解释。当然，我并不是对苏联学研究中的流行观点提出商榷的唯一学者，这一点，只要参看本书的脚注便可明了。不过我以为，本书是迄今为止在修正方面最为综合的探索。

然而我丝毫无意于贬低其他苏联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学术上的修正——即用新的探索并从更长期的观点对原来的答案提出商榷的过程——是任何名副其实的学术领域所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历史研究说到

底是“一种没有止境的论证”，比如关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至今犹争论不休，即其一例。要是没有那批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学者，尽管今天对他们的结论提出异议，任何修正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在本书中对老一辈苏联学家的解释提出批评，我本人受益于他们之处也可以从本书的脚注及其他已发表的拙著中看得很清楚。同时，就是我们这批可以笼统地称作修正派的苏联历史研究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当然现象，在始终存在着激烈争议的学术领域尤其如此。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按照上述新的历史理解，重新研究当代苏联政治。在我看来，政治与历史是统一的研究课题。任何国家今天的政治生活——它的意识形态、制度、社会关系、领导层、以及权力的行使——都是它的历史经验即一种凝缩的历史的直接产物。正如威廉·福克纳和苏联小说家尤里·特里福诺夫分别对各自不同的社会所说：“往事决不会消逝，它甚至根本就不是往事”。因此，研究当代政治的历史方法不仅有效，而且必需。如果政治分析不深深植根于对现实的历史认识，不是失之浮泛，便是流于谬误。

如果一般读者听说这种不言而喻、源远流长的关于政治认识的研究方法，从6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已经过时而无人问津，准会感到诧异。它已为与历史无关的研究与“方法学”所取代，即使在苏联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苏联的历史较短，而且饱经创伤，所以几乎是一个关于政治往事持久重要性的原始标本，正如一些苏联公民直觉地认识到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历史不在教科书上，不在毫无生气的纸面



上，——历史就在我们血液里”。但最近西方的一些关于苏联政治的研究却不是历史的。不少论著或者对苏联国内外政治赖以形成的真正根本因素未能予以如实说明，或者心照不宣地因袭着历来那一套陈旧的错误观念，结果使错误的对当代苏联的政治认识谬种流传，形成定论。而历史地研究苏联政治竟然也成了一种修正主义，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本书的主题是探讨重大历史事件和持久政治后果之间的关系。第一章是批判地概述关于苏联学的政治学术史，全面地说明必需重新考虑我们原来那套对苏联的思考方法的理由。第二章是对苏联历史上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斯大林主义的形成这几十年的重新考察。第三章是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后来发展的高度回溯本题。第四章探讨斯大林主义历史旧帐对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政治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分裂。第五章论证必须从整个苏联经验的背景上来理解贯穿于整个斯大林以后时期，从1953年直到今天的重大政治冲突。

从7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撰写本书，当时我打算写一组系列论文，分别成为本书的各章。因此，除第一章外，其他各章均保持原先的论文形式。但在结集成书时，我对每一章都根据最新的材料、学术成果和事态变化，重加厘定。对最后一章作了较大的扩充，使我的分析包容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短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以及以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首的高龄领导执政的头6个月。新材料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都要求我必须修改自己的论证或说明。

如果本书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主要归功于我在写作过程中所得到的各方面的帮助。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

金会在一个紧要关头支持了我的工作，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使我有可能是根据学术交流计划在莫斯科进行长期研究。象过去一样，我要对 20 多年来一直使我获益匪浅的良师益友和亲密同事罗伯特·C·塔克表示最由衷的谢忱。作为苏联学家，我们俩在对某些问题的解释上虽然也有分歧，但是我对他长期抱有的感激之情决不会因之而稍减。此外本书还承若干友人和同事分别审阅了各章，对我提供了宝贵的批评意见和有利的鼓励，在此一并致谢，至于他们可能不表赞同的论点，恕不在此一一列举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南希·莱恩兼备着任何作者所企望于编辑的品德——耐心、鼓励和严格要求。

最后，我要专门向多年来耐性细心地替我收集我所不了解或可能不理解的材料苏联朋友和熟人表示感谢。尽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会认为我的了解或理解还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多亏他们欣然同意我分享他们自己的“活生生的历史”，本书的内容才得以大大地充实和丰富。

斯蒂芬·F·科恩

1984年7月于纽约

# 第一章

## 学术传教：作为一门 专业的苏联学

人间吵闹怕引起人间嘲笑，  
越这样越助长着这种吵闹。

——亚历山大·普希金

《叶夫根尼·奥涅金》

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  
但现实的生命之树却欣欣向荣，四季常青。

——歌德

学术风气，也象股票行情那样，随时会出现涨落。苏联学——即指研究苏联专业的一个虽不雅致但却实用的字眼——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美国学术界曾经一度红得发紫。由于各种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的慷慨资助，各种俄苏问题的研究项目迅速地从东部哥伦比亚和哈佛扩展到全国的100多所大学和学院。行政机关、系科、课程、研究生、学术职务和政府职务、学术出版物以及图书资料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可是到了70年代初，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似乎突如其来地笼罩着

这个一度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领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大多数苏联学家说这场危机是财政方面的，此话不无道理。苏联学研究成了越南战争后的、通货膨胀的、预算意识的美国改变看法和改变优先考虑事项的牺牲品。基金会和政府机构把它们原来用于国际和外国问题研究的基金转向国内问题。例如，多年来一直是苏联研究主要资助者的福特基金会把它对国际问题研究基金总额从1966年的4,700多万美元削减为1979年的200多万美元。一些原来容纳研究项目并长期得到外部资助的大学已无力或不愿填补这个缺口。

这样一来，对苏联研究产生了极其糟糕的影响——经费、学会、大学生、学术职务以及高级研究机构统统走下坡路。正当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并且提出了较为长远的观点，因而有可能改进对苏联政治、历史、社会及经济的研究之际，可以使用的得力人员或可以培训从事这项学术研究的人员却越来越少。通俗些说，就在美国周期性地为“青黄不接”这一神秘武器所困扰的同时，苏联目前所拥有的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专家大约为我国研究苏联对外政策专家的3倍。

不过话又说回来，数量不等于质量。预算可以形成某一学术领域的规模，但是，它的根本繁荣却取决于它的学术生命。60年代有一段时期，美国的（确切些说，英美的）苏联学研究也遭受到一场比财政危机更深刻、更难觉察到的思想危机的袭击。它失去了曾经造成20年的学术繁荣并吸引优秀学生的目标、活力和规模。那场思想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生命内部的某种不健康因素——学术界对一切重大问题解释的事实上的共识。

政治、历史研究始终是苏联学的思想支柱，形成其总的前景及学术议程。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多数英美的苏联学家在说明苏联的过去和现在(有时也包括未来)时信奉一套彼此相关的解释作为其原理。根据这种解释方面的共识，就有所谓极权主义学派之称。它在将近20年的时期内一直是苏联学中的唯一的学派即正统派，不论实际的学术意图如何。

从那时起，关于极权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种模式或范例，已有多人撰文表示赞成或反对。但它也是苏联学的史学著述方面的正统派。事实上，在最初的苏联研究中，史学与政治学几乎是无法分家的；大多数论述苏联历史的一般性著作都出自政治学家的手笔，而即使是狭义的政治研究通常也采用历史的方法。这倒是早期苏联学的一种长处，因为政治认识必然要求历史认识。反过来说，不适当的历史分析必然会导致不适当的政治分析，这种情形在正统派苏联学中是屡见不鲜的。而极权主义学派关于当代(及未来)苏联政治的看法，基本上也取决于对1917年俄国革命到50年代初斯大林主义制度这一段苏联历史的普遍共识。

上述共识的政治史及其不足是拙作下一章的论题，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概括地提一笔，可以借用极权主义学派的说法，即它是贯穿于苏联历史与政治中一条恶性的必然的脉络，扼要归结如下：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一个没有代表性的、已经明显是或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极权主义小党，夺取了政权从而背叛了俄国革命。从此以后，就象在1917年那样，苏联

历史受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政治动态所左右，其最初的领袖列宁则是该党的化身，——独占的政治，残酷的策略，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纲领方面的教条主义，纪律森严的领导，以及集权的官僚主义组织。在迅速独占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并创造了初步的极权主义党国后，共产党人又依靠纪律、组织和残酷手段赢得了1918—1921年俄国内战的胜利。一方面由于筋疲力尽，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着必需确定列宁的继承人，该党在20年代从策略上放弃了对社会的极权主义设计，暂时采取了稍为缓和些的权力主义政策即新经济政策。但是到了1928—1929年，经斯大林整顿内部后，该党在意识形态狂热的驱使下，重新对社会发起极权主义的冲击。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必然在30年代达到顶峰，那是强制推行集体化和工业化的年代，与此同时，该党依靠大规模恐怖使社会极权主义化，并发展了种种官僚政治控制机构。出现了大一统的党国；独立的社会组织与过程，甚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统统被消灭。在1941—1945年对德战争期间，登峰造极的极权主义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过后来又故态复萌——以斯大林为首的、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的党国，至高无上地统治着由一盘散沙的新公民组成的消极而冻结的社会。

以上就是先前的正统派苏联学的精华。在极权主义学派内部，偶而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侧重点乃至提法上发生争论，这固然是事实，但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这种共识。但是，我并没有严重歪曲他们对将近40年的苏联历史与政治的基本再现与说明；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主流派苏联学文献中处处充斥着上述再现与说明，尽管形式有所不同。

1953年初版1963年再版的标准教科书直率地对正统派观点作了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表述：“从极权主义的萌芽中将产生登峰造极的极权主义”。

对于苏联学家在这种紧身衣似的解释的束缚下居然能完成如此充分的经验的学术研究，我们不能不感到惊讶。另一方面，作为史学兼政治学的正统派苏联学有许多错误，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极权主义学派把局部的识见扩大为完备的公认真理。从最坏的方面来说，这种共识等于要略、空洞分析和虚假说明。盲目的偏见、标签、意象、隐喻和目的论代替了实事求是的解释。

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说明，依然一片朦胧。历史分析归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一个命题：全部苏联历史必然贯穿着一种“完整的连续性”，从而大量排除真实的历史资料——冲突着的传统、选择、转折点和多元因果关系。政治分析则集中于一种把其“内在的极权主义逻辑”强加于一个逆来顺受、听任摆布的社会的统治方式，从而大量排除真实的政治资料——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阶级、组织、集团、世代、意识以及个性之间的冲突。苏联学——一门以多学科研究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为基础的学术专业——采取了自我贫困的行动。它把多样化和或然性统统排除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

60年代袭击苏联学研究、尤其是它的政治与历史研究的学术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此。兴旺的学术生活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怀疑并进行修正的过程。极权主义学派本可以通过诱发批评和相反解释而发挥有益的作用，然而这种共识多年

来一直原封不动。标准版的苏联历史与政治在60年代初大量出版后，有才华有抱负的后起之秀或者说这个专业本身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一切重大问题似乎都已提出并有了答案。苏联学文献无非是反反复复叙述那点基本情节或稍加发挥，因而日益成为陈辞滥调而令人腻烦。有才华的研究生改行的现象与日俱增，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苏联研究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已经有答案了”。1966年，甚至有一位高级专家也抱怨说：“标准化的交换意见进行了几十年。我建议咱们研究点新题目、新思想、新模式”。但是，姗姗来迟地赋予苏联学以新思想的，与其说是其本身的学术动态变化，毋宁说是苏联的政治变革，对于此等变革，苏联学既未能事先预测，又根本无法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这一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门吸收多种学科用以研究20世纪最有争议的政治史的学术专业，怎么会得出如此枯燥乏味的共识并长期维持这种共识？由于在这个学术领域于40年代末大发展以前，在为数不多的有代表性的英美的苏联学家中间并不存在这种共识，所以这个问题就加倍地错综复杂了。30年代至40年代，虽然研究的规模小得多，却可以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学术方法、解释和政治见解，既有敌视苏联试验的观点，也有同情乃至为之辩护的观点。苏联研究的这种较为多样化的传统为什么销声匿迹，在后来的学术界中一点不留痕迹？看来答案基本上不在苏联学本身，而在于其外。



## 冷战共识与使命

没有哪个学术领域象苏联研究那样同美国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长期以来，苏联问题一直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中占有重大的几乎无法摆脱的位置。以大学为依托的苏联学一直受到国际形势——从冷战到缓和——的冲击，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美国总统顾问、国务院的官员、大使及顾问。不仅如此，苏联政治史还同好几代美国知识分子的最深刻的信念和政治记述有着直接的紧密联系。苏联学的主要文献实际上包括形形色色非学术界人士的著述，从叛逃的共产党人、流亡者到政府的分析人员、记者等。简言之，一部详尽的苏联学史——它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干脆必须以现代美国史为其背景。

美国的苏联学是在冷战最恶化的年代发展成一门规模巨大的学术专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除少数学术记者和外交官外，人数不多的学术专家分散在一些大学里，主要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发展对苏研究的建议是由政府官员和学者共同商讨的，原型研究项目是在美国陆军、海军以及一所大学的资助下开展的，当时，美国和苏联还是战时的盟国。苏联在1943—1945年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这确保了美国的苏联学终于成长为一门专业。战后的40年代与50年代，两大强国处于从欧洲到朝鲜的危机四伏的对抗中，以及苏联于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后，只是在那一段时间里，苏联学研究经费才大量增加，各种研究机构才纷纷成立和发展。